

## 《譯叢》與我的學術研究

王 潤 華

現任台灣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兼中國語文學教授，既是《譯叢》的譯者，也是作者；作品於 1975 年首次在《譯叢》發表。

1965 年在臺灣讀大學的時候，我翻譯了卡繆（Albert Camus）的長篇小說《異鄉人》（*The Stranger*），後來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研究院時，1969 及 1970 年前後翻譯出版了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的長篇小說《大哉蓋勢比》（*The Great Gatsby*）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得到博士後，我再也不搞翻譯了，因為瞭解到翻譯是一門艱難的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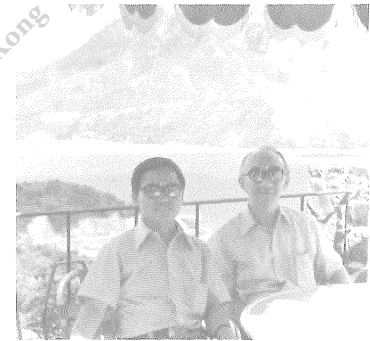
年輕時對翻譯的興趣，卻種下了《譯叢》對我的學術研究的厚愛與表揚的種子。1972 年我突然收到高克毅（喬志高）先生的信，他說他最近才知道我在 1969 年出版了《大哉蓋勢比》（臺灣中華書店），他在 1971 年也在香港翻譯出版了這本小說，書名為《大亨小傳》（今日世界社出版），因此很想跟我見面。可見我們當時在美國，差不多同時在翻譯著同一本小說。高先生是翻譯界大師，如果我當時知道，絕對不敢做下去。宋淇（林以亮）先生為高先生的翻譯寫了一篇導讀，宋先生也是大師級的學者，他對高先生的譯筆，稱讚有加。

1973 年 9 月我從美國回返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書，途中特地停留香港，前往中大拜見高先生與宋先生。他們兩人都是創辦《譯叢》的大功臣，這時候創刊號剛出版，因此特別興奮，幹勁十足，心中充滿了理想。《譯叢》創刊號中也有我太太淡瑩的詩《飲風的人》英譯，我也感到特別親切。1975 年 2 月宋淇先生寫信給我，他剛閱讀過我在《大陸雜誌》上發表的《我看〈長恨歌〉的梨花》（49 卷 11 期，1974 年 12 月），信中給我很大鼓勵，並提議把它譯成英文。他說「譯時對英文不必太講究，求其達意即可，因為克毅兄最

後會加以潤飾」(這信收集在我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書中)。我非常樂意做，結果高先生花了不少功夫去修改與潤飾，他的譯筆真是有妙手回春的魔力。譯文發表在《譯叢》第5期(1975年秋)。後來我又受命把《中日人士所見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流亡生活》譯成英文，發表在《譯叢》第23期(1985年春)。這兩篇文章本應署名翻譯人(我與高先生二人合譯)，但高先生卻堅持只放我的姓名，而且當作我撰寫的學術論文發表，不說明這是翻譯。高克毅與宋淇先生的學術視野、淡薄名利，只為學術工作的犧牲精神，令人欽佩。

《譯叢》全球化的視野，忘我的專業精神，繼承與發揚到三十年後今天。與我通過互聯網，因編輯工作有聯絡的孔慧怡博士就繼承了高克毅與宋淇先生的文化與精神遺產。她譯介中國文學時，也不忘記世界華文文學如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在她的努力下，2001年春季號的《譯叢》出版了一組新加坡華文詩歌的英譯特輯，其中也有我與內人淡瑩的詩。孔慧怡博士把我一篇論新加坡華文後殖民文學的論文的相關部分，請常易安(Ian Chapman)譯成英文，作為導論，而且在「編後語」中，把我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協助，大書特書，其實整個計劃都是她在拼搏。

《譯叢》前後發表我的三篇論文。1976年賴恬昌先生(當時是《譯叢》編委及中大出版社社長)又將我的研究司空圖的英文論文(*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f the T'ang*)由中大出版社出版。對我個人而言，我的學術研究得到表揚。就是這麼巧，這些論文正代表我的學術研究的三大領域，即唐代詩學、中國現代文學與華文後殖民文學。我的中國文學研究屬於邊緣思考的論述，很少中國中心論的思維，《譯叢》卻能夠接受我的論述，說明它有跨文化思維，全球化的行動。實際上，如果以《譯叢》在翻譯、學術、文化等更廣面的貢獻來論，則更顯而易見了。☒



王潤華(左)與高克毅在雍雅山房茶聚，1973。

王潤華